

种族主义与暴力恐怖活动

郝 时 远

内容提要 本文从生物学有关人类种族的研究入手,对种族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危害进行了分析,重点论列了以种族主义为背景的暴力恐怖活动。文章认为,西方列强在全球殖民主义扩张进程中对所谓“新大陆”进行残暴征服的实践,是当代恐怖主义的原型,甚至现代细菌战这样的恐怖主义武器也可以从殖民主义时期的生态扩张中找到其来源,而以希特勒掌控下的第三帝国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则是国家恐怖主义的典型。同时,文章认为,种族主义既是分裂人类统一性的罪恶之源,也是造成种族冲突及暴力恐怖活动的根源,而且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在全球化时代仍旧污染着人类社会,并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人类社会消除种族主义的斗争依然任重道远。

关键词 种族 种族主义 殖民主义 法西斯主义 恐怖主义

2001 年 8 月 31 日—9 月 8 日,联合国第三届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在南非的德班举行。来自世界 19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 万名代表,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35 位国家元首 and 160 个国家的外长与会。这次大会是在种族主义的历史余毒尚未肃清而新形式的种族主义问题又有所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同时,此次大会在南非召开也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南非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个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度。经过南非人民和国际社会几十年的努力,20 世纪 90 年代初人类社会最终结束了延续几百年的种族主义制度。进入新世纪的人类社会,虽然在国家层面上已经不存在种族主义制度,但是种族主义观念、种族歧视现象、种族排斥活动仍然存在,人类社会彻底消除种族主义依然任重道远,这也是新世纪第一年联合国举行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所要昭示的意义。

联合国第一届(1978 年)、第二届(1983 年)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都是以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为主题,而这次大会则是在进一步总结反对种族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今世界现实生活中仍普遍存在且有所增强的种族偏见、种族歧视现象进行揭露和谴责,以寻求共识和制订联合行动的对策。在这次会议上,非洲、拉美国家针对历史上西方国家罪恶的殖民统治及其带给前殖民地国家的深重灾难,提出了“殖民赔偿”问题。而阿拉伯国家则针对一年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占和镇压活动,要求会议通过一项将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共同加以谴责的决议。为此,美国和以色列的代表于 9 月 3 日退出了大会。巴以冲突、阿以矛盾、中东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热点”之一。联合国第三届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结束三天后,即 9 月 11 日,美国遭受了空前残酷的恐怖主义袭击。虽然这一事件与美、以两国退出大会并无直接联系,但是美国遭袭的诸多原因中却明显包括了中东问题、阿以矛盾和巴以冲突的背景。

自“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发动了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和以本·拉登为首的“基地”恐怖主义组织的战争,国际社会也在构建反恐主义的联盟。这样,对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越发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当今恐怖主义活动大多具有种族、民族和宗教问题背景的现象尤为引人注目。本文拟在论列种族、种族主义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对种族冲突中的暴力恐怖问题和种族主义的现状进行探讨。

一、生物学与种族

种族之别是人类自身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然现象,属于生物学范畴。现代生物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19世纪。从1800年“生物学”这一词出现在德国一份医学文献的注释中,到1802年德国的一位博物学家和法国的一位植物学家分别在自己的论著中使用了这一词汇,“生物学”开始引起欧洲科学界的普遍重视。而最早将它纳入学科范畴的是法国著名社会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他在19世纪30年代的著述中将生物学列为实证哲学中的一门高级学科,从而开始将博物学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生理学家、组织学家、胚胎学家、古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细菌学家和化学家等逐步吸引到该学科门下,并将生物学从博物学、医学等相关学科中逐步分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19世纪生物学发展的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说莫过于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阐释的进化论。这种揭示自然选择机制、论证物种起源的进化学说,在将“上帝”逐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开启了对人类起源的科学研究,尽管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仅有一句话提示了进化论对人类起源研究的意义。因此,“对人类进行科学研究,一般而言是伴随着达尔文主义的来临开始的”。^①但是,对人类种族差别的认识却源远流长,甚至在旧石器时代的岩洞壁画中就已经体现了不同肤色的人类群体,^②只是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后,才使这种认识进入了学科化的阶段。然而,生物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对人类种族的认识至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歧义,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仍旧困扰着人类社会。由种族偏见、种族歧视、种族排斥、种族冲突、种族清洗、种族纯净、种族灭绝等一系列非理性行为所导致的伤害,不仅充斥了20世纪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而且也成为21世纪伊始国际社会优先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

地球上的生命诞生于35亿—30亿年以前,哺乳类动物至少出现在6500万年以前,而人类和黑猩猩从其共同的猿类祖先中分化开来的年代一般认为是在700万—500万年以前。这种分离的发生地、也就是从猿进化到人的起始地在非洲,这是人类起源同源论的基础。最早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科学家也是达尔文,不过他在1871年发表的《人类的由来及性的选择》一书对这一观点的论证仅限于一种理论推导,对这一观点的实证支持是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从1924年在南非发现地质年代确定为早—中更新世的南方古猿塔昂(Taung)到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被确定为35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阿法(Afar),古人类考古学在非洲大陆的南非和东非取得了从大约400万—100万年前代表人类进化序列的上千个化石标本,^③由此证明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主流观点。而对自然万物进行分类并确定人类进化的位置,是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的关键,对此做出贡献的是出生于瑞典一神职人员家庭的林奈教授,他在《自然系统》一书

① [美]威廉·科尔曼著、严晴燕译:《19世纪的生物学和人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② 参见[英]艾尔弗雷德·哈登著、廖泗友译、冯志彬校:《人类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页。

③ 参见[美]理查德·利基著、吴汝康等译:《人类的起源》,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中首次将人类划分在灵长类中。这种分类法的发展使人类最终定位于: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人科是一个拥挤的家族,包括了很多已知的两足行走的南方古猿,其中一支进化为人属。能人(*Homo habilis*)作为人属的最初种类,大约生活在250万—200万年以前。对能人的判定除了通过头盖骨化石进行脑量测定外,主要是根据石器(工具),而考古学记录上的手斧则被确定为直立人(*Homo erectus*)出现的标志,其年代约为200万—30万年前。直立人是能人的后代,也是智人(*Homo sapiens*)的祖先。智人的出现,完成了人类在自然万物进化序列中的最后一环——智人种,他们出现在30万—20万年以前。

从生物学意义上说,人类是自然物种中的一个种属,即智人种。按照生物分类学的规则,对“种”的进一步分类是“亚种”,因此“人类的种族,是智人种的亚种”。^①所谓黑种人(尼格罗人种)、白种人(欧罗巴人种)、黄种人(蒙古利亚人种)的区别,仅仅意味着同源、同种的人类在向各大陆迁徙、扩散和适应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的过程中发生的体质变化,也称为“地理变异”。远古人类何时从非洲大陆向世界各大陆迁徙、扩散?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根据在各大陆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来看,一种假说认为,200万年前出现的直立人就已开始了这种大陆性的扩散,并在各大陆继续进化、发展为智人;另一种假说认为,非洲的智人在20万—10万年前开始向各大陆扩散,并取代了早期抵达欧亚大陆的直立人的后代。尽管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假说,但人类起源于非洲说不仅为古代化石所证明,而且也现代遗传学所印证。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不论在达尔文之前,还是在达尔文之后,西方人决不愿意承认白人与黑人共有一个非洲祖先。他们即便没有证据否认人类起源于非洲,但也仍然认为现代人是在各大陆独立演进的,由此形成了人类非洲起源论和人类多源起源论的尖锐对立。但是,“从一个遗传学家的角度来看,单一起源然后扩展,是两者中更为可信的”。^②科学证明与“上帝创造”之间的斗争始终未能结束,种族歧视、种族主义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难以克服的顽症。

二、早期体质人类学与种族划分

种族歧视的观念可谓源远流长,从古代洞穴艺术、壁雕、壁画到文献记载,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对异己种族(民族)的歧视性内容,如通过体态的大小和某些特征来强化自己和弱化或丑化敌人的绘画;用描述兽类的字眼来形容他族的文献,等等。但是,使这种歧视观念理论化、制度化和社会化的实践则是随着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扩张而出现的。15世纪末开始的所谓“新大陆”探险,使世界各大陆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接触,但这种接触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西方人在遇到所谓“新大陆”的居民时,是以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有恃无恐的征服欲、贪得无厌的攫取心来面对那些古老文明和“有色人种”的。这种接触不仅造成了“最优秀的土著文化在最劣等的西方文化冲击下陷于消亡”^③的悲剧,而且也使西方世界的科学发展渗入了种族优劣观念的成分。尤其是在解剖学、生物学及由其而产生的体质人类学和人种志等学科性研究方面,一些人类学先驱在有关人类和种族的科学探索中,或多或少地从生物学角度对人类的差异进行了区分和解释,如16世纪维塞利亚斯的头颅测量,斯皮格尔的头颅线测量;

① 美]斯蒂芬·杰·古尔德著、田晓译:《自达尔文以来》,三联书店,1997年,第253页。

② 意]L·L·卡瓦利-斯福扎、E·卡瓦利-斯福扎著、乐淩河译、杜若甫校:《人类的大迁徙》,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③ 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著、马胜利译:《地球·祖国》,三联书店,1997年,第79页。

17 世纪约翰斯·珀林的《体质人类学》,撒母耳·哈尔斯的《人类学》,泰森的比较形态学;18 世纪林奈的分类法,培丰的《动物自然史》,布鲁门巴哈的《原始人种学概论》及其头盖学,彼得坎波的面部角度测量法,查尔斯·怀特的人体测量,等等。这些研究方法及成果在挑战神学、探索科学的同时,也为殖民主义者利用人类体貌、肤色的差异实行种族歧视、种族压迫、种族灭绝提供了理论依据。

进入 19 世纪以后,体质人类学在对人类不同种族的活体测量方面取得了进一步发展,而利用这种知识来表达种族歧视观念的现象,不仅反映在欧洲人对其他大陆所谓“有色人种”的研究和描述中,而且也发生在欧洲不同民族之间。例如,在法国的人种学研究中,认为法国人是高卢血统,而征服者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则是蛮族血统;^①甚至普法战争后法国人力图将其宿敌证明为与芬兰人、拉普人(萨米人)无异,是来自亚洲的野蛮蒙古人种而非日耳曼人。由此引起的学界争论,促使德国政府下令对德意志帝国的 600 万学龄儿童进行头发、眼睛的颜色调查,^②这是近代欧洲最大规模的体质测量活动。而这一事件的影响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德国源自启蒙运动时期以条顿主义为代表的日耳曼民族特质论,而且还使德国成为现代欧洲极力鼓吹种族主义并在法西斯主义时期残酷实行种族屠杀的国家。当然,有关种族主义理论的形成,主要是在人类起源这一根本问题的研究中对黑人、“红种人”(印第安人)等非白人进行种族优劣划分的结果。特别是 19 世纪中期,在欧洲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社会氛围中,对民族特征永恒性的强调和对外进行殖民地瓜分的争夺,使西欧、北美的种族主义观念也日益强化。这一时期,种族主义观念最为昭彰的代表作是法国人戈宾诺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在这本臭名昭著的随笔中,作者认为日耳曼人是传说中的雅利安人最纯正的后裔,而由于民族间通婚杂交造成了优秀种族生命力的堕落和文明的衰落。在宣扬种族主义方面,“戈宾诺是一个激起瓦格纳、尼采和希特勒思想的先驱”。^③可悲的是,这种非理性的观念并没有因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削弱,反而由于进化论造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界限的模糊而使一些人“将人类社会的变化归结为生物进化规律,因此而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或政治意图(社会达尔文主义)”。^④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种族主义

近代的西欧虽然经历了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人人生而平等”的资产阶级人权理念亦得到了广泛的宣扬,但是这不仅丝毫没有妨碍欧洲人在殖民扩张中对“劣等种族”进行屠杀和贩运,而且由于对黑人、黄种人不属于“伊甸园”后代的种族划分而使这些暴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中关于物种内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观念,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启示是对个体竞争的利己主义的鼓励,而大工业时代的到来及其所引起的阶级矛盾尖锐化,又导致另一种形式的自然主义思潮出现,它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条中,最基本的是绝对的利己主义以及竞争能够保证胜利者拥有明显有利的优势。”对于进行全球殖民征服和掠夺的西欧工业国家和美国来说,按照弱肉强食的自然“丛林法则”争夺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所遵循的正是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因此,

① 参见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王章辉等译:《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94 页。

② 参见 [英] 艾尔弗雷德·哈登著、廖泗友译、冯志彬校:《人类学史》,第 38 页。

③ [意] L.L. 卡瓦利-斯福扎、E. 卡瓦利-斯福扎著、乐浚河译、杜若甫校:《人类的大迁徙》,第 309 页。

④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张晓华等译:《资本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53 页。

1865 年以后的美国,以及稍晚一些时候的德意志帝国,培育了最奔放、最严酷无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一学说还为日益升级的种族主义论点提供了受人欢迎的确证。”^①

1883 年高尔顿“优生学”理论的提出,虽然“以其贫困干涉主义和坚持生物 - 社会规划而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区别”,^②但是这一理论的本质在强化种族主义方面更加极端。高尔顿的“优生学”所忧虑的是:平民阶级比富人阶级有更高的生育率,从而导致西方种族才能的下降,使白人在同其他种族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种“优生学”理论在试图消弭阶级斗争的同时,又将人类社会的冲突归结为种族优劣的竞争。总之,到 19 世纪末,种族主义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等思潮的影响下被理论化了。

20 世纪,随着考古人类学的发展,虽然有关人类起源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争论得到了科学的阐释,但是种族主义却继续在社会生物学、遗传学和有关的智商研究中寻求理论支持。而且,在 20 世纪的百年历史中,人类社会还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法西斯主义式的种族主义实践的肆虐,它不仅为人类社会留下了国家恐怖主义的黑暗一页,而且也使奉行种族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成为影响新世纪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殖民主义时期的种族主义暴力恐怖活动

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使以“白人至上”为核心的种族优劣观念在征服美洲、贩运黑奴的过程中产生。19 世纪后期,西方殖民主义者在瓜分非洲和建立全球殖民主义体系的角逐中,利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为其殖民扩张和“白人至上”的统治地位提供理论依据,形成了臭名昭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殖民者认为,根据自然生存法则,建立殖民地是“优秀种族”和强大国家繁荣与生存所必须的,那些“劣等种族”和“劣等民族”只有在白人的“保护”和“教化”下才能进步,等等。“白人至上”的观念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得到理论化的发展,并且同欧洲传统的对外扩张、开拓生存空间等帝国主义非理性思潮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分裂人类统一性的罪恶之源——种族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种族歧视、种族主义从产生到实践,始终伴随着暴力恐怖活动。或者说,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是通过暴力、恐怖行为加以推行的。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亚洲的征服过程中,殖民者的人数虽然居于少数,但是他们拥有“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和肆意虐杀的残暴心理,他们对殖民地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征服和统治都是通过残酷屠杀和非人虐待来实现的。其中,西班牙人以几百人之兵征服中、南美洲规模庞大的印第安人帝国的例证最具典型性。1519 年,科尔特斯率领 600 名西班牙人凭借几门火炮、13 支滑膛枪、16 匹马完成了对拥有数百万臣民的阿兹特克印第安人帝国的征服;1531 年,皮萨罗率领 168 名西班牙人以 27 匹马、2 门火炮完成了对拥有数百万臣民的印加帝国的征服。在这一征服过程中,西班牙人靠的是在远距离用火炮、滑膛枪给印第安人造成大量伤亡、惊吓以及骑在马上对印第安人进行肆意欣杀,迫使数万人的印第安卫队在极度恐惧中溃败逃散。可以说,这种极少数人对数百万人的征服完全是建立在先进武器和暴虐屠杀基础上的。而西班牙人在征服过程中利用欺骗等手段扣押阿兹特克帝国军事首领、印加帝国国王为人质并利用这些被印第安人奉若神

^① [美]威廉·科尔曼著、严晴燕译:《19 世纪的生物学和人类学》,第 95 页。

^② [法]米歇尔·弗伊著、殷世才等译:《社会生物学》,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17 页。

明的领袖人物索取财宝和消除抵抗的讹诈行为,以及摧毁那些代表印第安人神圣信念的神庙和宫殿的破坏性行径,^①事实上体现了恐怖主义原型的基本要素:残酷屠杀造成大规模伤亡及无辜所产生的普遍恐惧,扣押人质索取赎金和造成投鼠忌器的态势以消除对抗的讹诈行为,摧毁标志性建筑造成人们信念的崩溃和社会解体等。

类似的暴力恐怖活动在英国人等欧洲人征服北美印第安人,英国人征服澳大利亚土著人,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等列强在非洲“猎捕”黑人、贩运黑奴,以及美洲白人种植园主对黑奴的残酷奴役(包括对逃亡奴隶施以剁手、砍腿之类的暴行)等实践中具有普遍性。通过肆意屠杀平民和残酷的刑罚,造成被征服者、被统治者产生普遍的恐惧心理和形成恐怖的社会氛围,是建立殖民统治、维护白人权力、实施种族(民族)压迫、进行剥削奴役的重要手段。虽然暴力恐怖行动在古代历史上的战争和统治实践中始终存在,但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在进行全球性征服中所采取的暴力恐怖手段,更为直接地构成了现代恐怖主义的历史雏形。甚至连现代恐怖主义活动中最令人生畏的细菌战,也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因为“欧洲人随身带来的病菌乃是他们最强大的征服武器”。^②历史事实证明,“人类历史上致命病菌的重要性,可以从欧洲人征服新大陆并使那里人口减少这件事得到很好的例证。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病菌的,要比战场上死于欧洲人枪炮和刀剑的多得多”。^③西方人对美洲等大陆的征服,除促使不同种族的洲际扩散外,还引起了生态因素的扩散,包括植物、动物和细菌。而白人征服者携带的欧亚大陆的细菌在传到美洲、非洲、澳洲后,对当地人的生存所造成的威胁是十分巨大的。1520年西班牙人带到墨西哥的天花,迅速在印第安人中流行开来,阿兹特克印第安人近一半因此死于非命。作为生物地理学因素的产物,病原菌洲际传播所导致的“流行病交流的不平等性使欧洲入侵者获得了巨大的优势,而给其祖先定居于泛古陆裂隙失败一方的部族带来了毁灭性的劣势”。^④到1618年,美洲大陆原有的2000万左右的印第安人口急剧减少到160万左右。殖民主义时期无意识的病菌洲际传播造成的种族灭绝性灾难,为有意识地利用细菌进行战争和恐怖活动提供了历史启示和实证。

五、法西斯主义时期的国家恐怖主义

西方殖民主义者制造和奉行的种族主义,在法西斯主义出现后达到了顶峰。尽管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极端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但是,法西斯主义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极权主义、黥武主义、种族主义、扩张主义等思想,出现了“世界由纯种的雅利安人统治,而日耳曼人又是雅利安人中最优秀的民族”、“意大利血液的无穷活力”和“日本人是天子之孙”之类的种族主义喧嚣。同时,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还使恐怖主义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残暴程度。以德国法西斯通过集中营、毒气室和焚尸炉对犹太人等所谓“劣等种族”、“劣等民族”进行大规模屠杀为代表的种族灭绝之祸,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后进行的大规模屠城,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为黑暗、最为残酷、最为恐怖的一页。

^① 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43—144页。

^② [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③ [美]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

^④ [美]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著,许友民、许学征译:《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9页。

种族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枢纽。希特勒对人类种族的划分在生物学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文化的观念,即人类分为“文明的奠基者”、“文明的支持者”和“文明的破坏者”。在他看来,只有雅利安人尤其是雅利安人中的日耳曼民族是“文明的奠基者”,那些受到雅利安文明影响或改造的人(如日本人)属于“文明的支持者”,而犹太人、黑人则是“文明的破坏者”。所以,德国人同“非德裔民族的杂交,完全违背了永恒的造物主的意志”,^①保持种族血统纯洁性必须建立在对其他“低劣种族”的排拒基础之上,而对那些“文明破坏者”来说则是从肉体上消灭。这种从生物学角度对人类进行优劣、贵贱划分的排他性分裂意识,是通过宗教神秘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思想对本民族民众进行观念灌输和社会动员来普及的,是通过维护种族(民族)的高贵血统和宣扬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来掩盖本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以形成一致对外的,这使法西斯主义建立了相当广泛的民众基础,并在威权主义、“铁血政策”的政权控制下形成了国家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此外,在法西斯主义的哲学中,暴力强制的“权力意志”是其最重要的内容。所有的法西斯组织都崇尚暴力,因为法西斯主义认为暴力是强者力量的体现,是征服和统治弱者的基础,而最能体现暴力程度的是残酷,最能反映暴力效果的是恐怖,所以,法西斯主义势力在攫取政权、实施统治和对外征服过程中,都以残酷的暴力和制造恐怖氛围作为实现其目标的基本手段。例如,1938年11月9日夜,纳粹发动了全国性的反犹暴力恐怖活动,仅在柏林一地就有91名犹太人死于暴徒之手,2万人被关入集中营,7500家犹太人商店被捣毁,28座犹太教堂被焚烧,200处犹太人设施被破坏。^②这就是被称为“水晶之夜”的排犹暴力恐怖事件。

为了强化暴力恐怖特征,在法西斯主义政党、政权结构中有专门实施暴力和制造恐怖的组织力量,如德国的盖世太保、党卫军,意大利黑衫党人组成的冲锋队,法国“法兰西行动”中的“国王的宫殿”,“英国法西斯联盟”中的黑衫卫队,以及罗马尼亚铁卫军,匈牙利“箭十字党”中专事暴力活动的力量,等等。这些专门实施暴力恐怖的组织,不仅在法西斯组织体系中享有特权,而且还通过某些标志身份和组织归属的符号来强化其令人畏惧的特征,如黑衫、卐字等体现某种威权、特权和神秘主义恐怖感的标志。这些在国家司法镇压体系之外的恐怖镇压体系,一方面通过对民众和纳粹组织本身的暴力强制来维护领袖意志和独裁权威;另一方面则通过残忍、严密、神秘的恐怖主义手段对政敌、“劣等种族”、反对者进行非人的折磨和残酷的屠杀。如德国党卫军所属的集中营系统,就是这种法外恐怖镇压体系的突出代表。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最后解决”计划,就是通过集中营来实施的,以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代表的集中营体系成为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工厂。在那里,犹太人失去了做人的尊严,遭受了无数的残暴、虐待、侮辱和嘲弄,最后在毒气室里丧生,在焚尸炉中化为灰烬。在这场浩劫中有600万犹太人如同牲畜一样被宰割,而且大屠杀的幸存者也终生无法摆脱深重的恐惧。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恐怖主义活动除了通过有组织的方式推行外,主要通过法西斯主义分子个人的残忍、施虐心理和行动加以实施,从而将人性“恶”的一面推向了极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期间对中国人进行的残暴杀戮中,也包括在非战场对抗状态下所进行的砍人头比赛等宣泄残酷、制造恐怖的暴行。

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和研究,通常疏于对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国家恐怖暴行和战争中对无辜平民大规模屠杀行动的关注,甚至根本没有将这些暴行纳入恐怖主义的范畴。其重要原因是对恐怖主义的认识局限于非战争状态下“以弱对强”的隐蔽性、偷袭性和颠覆性等特征的认识和道德评判,而忽视或无视统治阶级、国家政权实行的恐怖主义政策。事实上,国家层面上的

① 奥]威尔海姆赖希著、张峰译:《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68页。

② 参见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恐怖曾是“历史上,通过在被统治者中间制造恐惧心理以达到维持权力和推行政策的一种经常运用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服从和阻止反抗”。^①同时,“不管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内战,抑或只是一次公众革命,只要是在有争斗的局势中,恐怖主义是任何行动者都能采用的暴力手段”。^②以德国纳粹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统治,是世界现代历史中最典型的国家恐怖主义。尤其是纯粹利用种族主义进行“纯雅利安人”(日耳曼民族)的社会动员来消灭犹太人等“劣等种族”以及进行对外征服战争,突出地表现了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制度化、公开性和社会化的特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体系的崩溃和世界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实行恐怖主义的行为主体更多地被视为非政府、非官方的颠覆性组织。因此,在世人关注核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带来的安全威胁,尤其是关注那些极端性、失规制(Deregulation)性的恐怖主义组织谋求这类武器以增强其实现政治目标的威胁、讹诈和破坏能力时,都不会把率先使用核武器而令世人切实感知其恐怖效应的1945年美国对日投掷核弹的行为视为恐怖主义或恐怖主义活动。其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核打击结束了法西斯主义者发动的世界大战,所以被认为在道义上是无可指责的。

六、当代种族主义的暴力恐怖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算,其中既包括对欧洲和相关国家纳粹分子的判决和清理,也包括对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批判和观念的清肃。但是,由于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和战后欧洲政治形势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洲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极端右翼势力。这些极右政治势力在政党化、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使民族主义的保守性、种族主义的排外性在民间形成思潮,成为滋生新法西斯主义的土壤。特别是全球殖民主义体系崩溃后,前殖民地向前宗主国反向移民的浪潮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持续高涨,在欧洲、北美等地区的一些国家里出现了移民恐惧症,排拒和迫害移民的暴力恐怖活动日益猖獗,并在90年代形成高潮。

在这一过程中,除了一些传统的种族主义暴力组织外,美国的“三K党”等形形色色的新法西斯主义暴力组织也在欧洲、北美、拉美和亚洲的几十个国家中出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西欧国家极右翼政党在议会(包括地方议会)选举中普遍出现地位上升甚至获得优势,新法西斯主义的活动也更加公开,大量宣传反犹主义和为大屠杀辩护的出版物公行于世,“光头党”等佩带法西斯徽章的暴力团伙不仅大量复制和传播纳粹时期的“光荣影片”,而且通过焚烧犹太教堂、毁坏犹太人公墓、袭击非白人移民、对难民营地进行纵火和爆炸等暴力方式宣泄种族主义仇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极端组织袭击黑人、焚烧黑人教堂的事件频繁发生,白人警察对黑人、拉美裔人的暴力行为也屡见不鲜;在德国,“光头党”等新法西斯主义组织每年制造的种族排外暴力事件就多达数千起;在奥地利、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以及北欧国家中这类事件也均有程度不同的表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极端民族主义的膨胀也导致新法西斯主义在原苏联、东欧地区出现,如系统地喧嚣法西斯主义的极右翼势力——以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铁卫军在罗马

①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65页。

② [英]约翰·格里宾等著、朱善萍等译:《历史焦点》上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3页。

尼亚的死灰复燃;新纳粹组织在德国东部地区纷纷建立;波黑内战中克罗地亚民兵重新佩带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专事民族仇杀的法西斯组织“乌斯塔莎”的黑色U型标志,等等。

以“光头党”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新法西斯主义暴力组织,虽然没有系统或统一的理论,也没有形成政党化的发展,形同街头帮派和犯罪团伙,但是却崇尚希特勒和暴力并对现实社会狂妄排拒。在它们的信条中,认为存在一种世界性的反对雅利安人的阴谋,而这种阴谋的策划者包括了魔鬼、犹太人、共济会乃至所有制约或影响民族国家主权的国际组织。因此,新法西斯主义维护欧洲、国家、种族、民族的纯洁性以回归历史和构建未来的信念都是建立在否定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其对未来的空想只能通过回归历史来充实。但是,这种回归历史仅仅是在理念和行动上回归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时代。我们仅从新法西斯主义组织的群众基础来看,其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的主要影响面是青少年,“光头党”等新法西斯主义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都是15—21岁的青年男女,这同德、意法西斯主义早期的情况十分相似。例如,在希特勒攫取政权期间,大量吸收14—18岁的青年人参加法西斯青年团、冲锋队;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政党组织的295.49万名成员中,法西斯青年战斗队(18—21岁)、先锋队(14—18岁)、法西斯青年团(14岁以上女子)的成员达到86.83万名,占29%以上。^①法西斯主义利用青少年容易受鼓动、争强好胜、盲目崇尚某种信念等特点,使他们在法西斯主义嚣张的初期成为街头暴力中最具破坏力的“生力军”。德国法西斯在攫取政权过程中对犹太人进行的民间性攻击,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

当代新法西斯主义组织不仅在成员的年龄结构上同早期法西斯主义组织有共同之处,而且它们的行动也是通过街头暴力、法西斯主义宣传来加以彰显的。在这方面,德国的新法西斯主义组织表现得尤其突出。在德国统一后的几年中,种族排外事件呈几十倍、数百倍地逐年增长,仅1992年就发生了3000多起暴力排外事件,其中包括震惊世界的“罗斯托克事件”。1992年8月22日,几千名的新法西斯主义分子对罗斯托克郊区的难民营地进行了数天的暴力恐怖袭击,他们纵火、投掷石块、谩骂、殴打,并高呼“德国是德国人的”、“外国人滚出去”之类的口号,而当地围观的德国居民却纷纷为之鼓掌叫好,以致这一事件引起德国很多城市新法西斯主义组织的响应,萨克豪森集中营的犹太人纪念馆也是在这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中被焚毁的。^②这些新法西斯主义团伙试图以肆无忌惮的暴力恐怖活动引起社会注意和震动公众,特别是引起不同种族、民族的外来移民的恐惧。这些活动虽然表现出刑事犯罪的特征,但是这种在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政治观念主导下的暴力活动及其所造成的某些社会群体的集体恐惧,则属于恐怖主义活动范畴。极右翼政治势力的种族排外主张,也往往是通过这些街头组织的恐怖活动来加以实践的。

在恐怖主义组织的分类中,新法西斯主义组织一般被划为极右恐怖主义类型。^③不过,形形色色的新法西斯主义组织,其政治目标和恐怖活动方式并不一样。有些组织以反对现存社会制度为目标,其恐怖活动并不主要针对某些种族和民族群体,而是针对社会。这些组织的共同特性是以推翻现政权和改造社会为政治目标,它们具有准军事化的武装系统,对政要、重要设施、无辜平民进行暗杀、爆炸等恐怖主义袭击,同时也主张通过议会等政治方式攫取政权。而大多数新法西斯主义组织则以喧嚣极端民族主义和推行种族主义为政治目标,这些新法西

① 参见杜美:《欧洲法西斯史》,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② 参见吴华等主编:《全球冲突与争端》(欧洲·美洲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34页。

③ 参见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斯主义组织的政治目标虽然同上述以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宣扬纳粹精神的极右组织有类似之处,但是其暴力恐怖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种族排外和张扬种族主义,所采取的手段仍具有街头暴力的特点。

七、消除种族主义任重道远

人类是统一的,即同源、同种。种族的划分在生物学、遗传学方面虽然有一定科学意义,但是不具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意义。因为无论是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还是由他们混血形成的多达 60 种的亚种族,他们中的育龄男女婚配后都可以正常地繁衍后代,他们在生理上没有任何先天的智力差异;甚至不同种族中先天的聋哑人(缺乏后天学习或模仿能力),他们表达心理和感情的方式同健康人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也有伤心的哭泣和愉快的微笑。因此,在生物学、遗传学意义上人类是统一的。然而,现代“生物学对人类统一性的确认丝毫未能削弱对人类进行优秀种族和低劣种族的等级划分”。^①其原因就是由西方殖民主义时期制造的种族主义至今仍是分裂人类的最重要观念之一,同时也是造成种族冲突乃至种族主义暴力恐怖活动的重要根源。

人类社会虽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最终消除了国家制度层面上的种族歧视和隔离,但是种族主义这份“丰厚的历史遗产”却仍旧留给了 21 世纪。自 19 世纪中叶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来,鼓吹种族主义的伪科学也不断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转换着自己的面貌。到 20 世纪 20 年代,虽然种族主义的重演论在理论上破产,但是“优生学”的智商测验却得出“单纯的教育不可能使黑人种族与高加索人具有相同的竞争能力”的结论。^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对全人类的肆虐和种族主义暴行扩展为欧洲白人之间的实践,无疑使数百年来奉行“白人至上”理念的欧洲人受到了震动。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殖民帝国的瓦解,也迫使西方人在不情愿地承认“民族自决原则”的同时,重新审视包括种族主义在内的伪科学,因为毕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种族主义的讨伐。战后美国有关奴隶制和黑人境遇的研究促进了人们对人类统一性的认识,甚至出现了诸如“从内心世界来讲,黑人只是长着黑皮肤的白人”这样的观点,^③这些科学的研究为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掀起的民权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这并没有避免 70 年代美国有关黑人问题研究中出现的“奴隶是种族主义种植园的‘受益者’”等理论的反扑。1975 年威尔逊发表的《社会生物学》中有关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的论述,以生物学决定论为基础提出了“基因遗传控制人类特定社会行为”的观点,声称在基因利己主义的基础上人的本性完全受竞争支配,好战、排外、统治、侵略甚至妇女的顺从都是天赋的模式。在这种生物学决定论中,“社会及政治含义的作用”使“受人尊重的科学变成极右派手中挥舞的护身符”。^④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曾一度销声匿迹的美国种族主义暴力恐怖组织“三 K 党”死灰复燃,并大量制造针对黑人的暴力恐怖事件,不能不说同上述种族主义理论以新的“科学”面目出现直接相关。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类似的现象更加普遍,科学与“上帝”、理性与暴力之间的种族主义

① 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著,马胜利译:《地球·祖国》,第 46 页。

② 美)斯蒂芬·杰·古尔德著,田译:《自达尔文以来》,第 269 页。

③ 参见陈其:《美国史学界黑人奴隶制研究综述》,http://www.pep.com.cn/lishi/xueshu/dtzs/19.htm。

④ 法)米歇尔·弗伊著,殷世才等译:《社会生物学》,第 3 页。

斗争正在更加广泛的领域深入发展。它不仅表现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新一轮的挑战,如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鼓噪下,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1981 年通过了公立学校在教授“科学进化论”时也必须以公允的态度讲授“科学创造论”,^①而且,除了种族主义街头暴力恐怖活动的嚣张表现外,利用国际互联网络传播种族主义观念和宣扬种族歧视也已“蔚然成风”。至于被称为遗传学革命的“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自身所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种族主义。人类对核弹的威力与危害已经有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认识,所以对核扩散及核技术被恐怖主义组织掌握的危险极其关注。但是,对 DNA 技术加上种族主义会产生一种“生物核弹”的威胁还不为大众所了解。事实上“金钱将可以造就一个优良人种(master race)”的“高科技”种族主义已经开始显现。^②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在新世纪对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关注,的确是意义重大和影响深远的。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he known biological research findings on the human rac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harms of racism. It illustrates and emphatically discusses some terrorist activities under racism. In the author's opinion, the prototype of the contemporary terrorism comes from the atrocity in and conquest of the so - called "New Continent" by the Western power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colonial expansion. Even the origin of some terrorist weapons such as modern bacterial warfare could be found in the ecological expans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colonialism. The Third Reich controlled by Adolf Hitler, the fascist regime, is a representative of state terrorism. The paper holds that racism is the evil source, which results in not only disruption of human unity but also racial conflicts and acts of violence. Still, racism with its historical roots is deteriorating human societi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surfaces repeatedly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Therefore the world community has yet a long way to go from eliminating racism.

(郝时远,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北京,100081)

责任编辑:吴家多]

① 参见 [美] 詹腓力著、钱锺等译:《审判达尔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第 1 页。

② 参见 [美] 卡尔·德尔里卡著、陈建华译:《双刃剑:遗传革命的前景与风险》,湖南科技出版社,2000 年,第 169 页。